第一部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的通史

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材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tongshi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

雷 达 赵学勇 程金城 主编



上 册

甘肃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定价(上、下册)：96.00元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tongshi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

雷 达 赵学勇 程金城 主编

上 册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雷达，赵学勇，程金城主编.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226-03445-X

Ⅰ.中... Ⅱ.①雷...②赵...③程... Ⅲ.①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Ⅳ.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0965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

主　编：雷　达　赵学勇　程金城

责任编辑：刘铁巍
封面设计：马占庆
校　　对：叶淑媛

出　　版：甘肃人民出版社
发　　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730000)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电　　话：0931-8773224(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gsart@126.com
Http://gsart.home.sunbo.net
装帧设计：[redacted]
印　　刷：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1126千
印　　张：64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226-03445-X
定　　价（上、下册）：9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

第一部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的通史

责任编辑：刘铁巍
E-mail:ltw_93220000@163.com
封面设计：马吉庆
E-mail:mjq008@163.com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 论

上世纪80年代，有识之士提出了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并力图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整体观”或者“20世纪文学”的构想是带革命性的，它使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掀开了新的一页。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发现，在获得了一种宏观学术视野的同时，或者在被输入了一个新思维框架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如何“贯通”和将整体观“具体化”的途径，整体观也还没有真正渗透进文学史的骨骼和血脉之中。因为我们需要追问：究竟在哪些重大问题上，现、当代文学原本就是贯通着的？它们又是以何种形态贯通着？我们用怎样的“灯光”才能照亮、发现、揭示和描述这种贯通？这里应该既有思潮、精神上的贯通，也有文体、方法和作家跨代上的贯通。然而，答案往往是宏大而抽象的。在时间的河流里，原先的畛域正在日益模糊，而“贯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对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有待于不断发现的学术空间。

一、“既分又合”——“分期”再认识

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的书名，意在强调，现代和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就史的意义而言，任何历史都是斩不断的河流，所谓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之类的划分，无非是人为的拆解——既为断代史，就不无切割之意。这种“切割”，应该是人类历史理性和文化反思精神的表现。例如，就科学意义而言，把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分开，是因为它们之间好像河床断裂后形成了瀑布，落差明显且面积很大，可是，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似乎就没有如此之大的落差了，所以才有人说，“将中国从古到今的文学以1917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古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文学时期——是适宜的”[①]。

① 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早先的多种现代文学史，曾经以社会政治时段划分，有的甚至以党史和军史时段来划分，比如按照“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么一路排下来的叙述方法，就与社会政治史或“阶级斗争史”完全重叠合一。而且，多年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被分成两个概念，两种形态，两门课程，并作为两种截然不同背景下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史来讲述。在这里，社会政治背景的不同，不同政治背景下文化语境的不同，以及不同文化语境下文艺思想的分野和交锋，被过分地夸张出来。这种述史方式，颇多二元对立的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两分哲学理念，从根本上说，它受到太多社会学方法、阶级分析法、政治决定论的影响，以至造成了对文学本身规律性的遮蔽。回头来看，这种方法对文学史的写作是多么不伦不类！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这曾是唯一的治史方法。然而，文学的内在规律是不会断裂的，随着外力的减压，内在的关联性和深刻的延展性就自然地浮出水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政治决定论式的文学史叙述方法逐渐消解之后，当某些曾经非常显赫的外在因素日渐淡出之后，我们看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由于文学内在规律的贯通性，“分”的因素在逐渐淡化，“合”的因素在逐渐凸显，相互的融通之点越来越多，它们开始自在地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并继续演进着。

本文学史仍沿用了使用过五十年的概念，承认原来对现代和当代的划分是有深刻根源的，难以贸然取消。关于分期问题，当今学人提出了各种各样新的见解：比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于1985年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主张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①]；与此相呼应，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主张打破现代与当代的学科界限，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它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与台港澳文学，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难以分割的文学整体；此外，“百年文学”这一提法也颇风行，它包含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倡扬打通近代与现代的藩篱并把近代文学并入现代文学，也即把现代文学的上限提到1840年左右；一是以范伯群为代表，力主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②]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处于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过渡期，尚不具备现代性，只具有近代性，因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故而只能以“近代文学”称之等等。在当代文学方面，有人提出了将已经展开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当代文学”——大大超过了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段——加以明细化的意见；还有人主张，只将最近十年的文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② 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4期。

学称为"当代文学",其他的一律归入"现代文学"。在这些意见中,"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流布最广,现已有多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问世。尽管这一提法显示了宏观、大气的学术视野,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并力图建构开放性、整体性的学术格局,但证之于历史本身,却不无某种"理想性假定"的成分,甚至受到了"西历"的公元、世纪式统计法的潜在影响。我们之所以未敢贸然接过这一分期概念,也是因为感到上述提法尚不足以撼动原有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划分。

这部文学史何以还是认同把1917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始和上限呢?为什么不从公元1900年算起,或者从戊戌变法算起,从"诗界革命"提出算起呢?诚然,晚清文学中已含有大量现代性质素,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近代以来,既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黄遵宪等人充满民主精神的诗文,"我手写我口"的诉求,也有以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为代表的颇具声势的"改良主义文学运动"。他们都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文学观念,崇白话而废文言,直至抬高甚至夸大小说的启蒙功能。然而,我们仍然不难发现,总体看来,他们在政治上,对封建制度并不否弃,对清王朝仍抱以幻想;在思想上,并无深刻质疑以至推倒儒家学说的彻底批判精神;在创作上,暴露"官场"固然痛快淋漓,对于底层民众则隔阂甚深,于是写到后来,由"谴责"而走向"黑幕";鸳蝴小说虽多用白话,大多却于风花雪月中传达着比较陈腐的士大夫意识。晚清文学固然不乏某些现代意识和民主锋芒,但从根本精神上看,它与古代文学毕竟属于同一个大的思想道德体系。质言之,它还没有与旧文化旧文学一刀两断的决心和勇气。所以,真正的分水岭仍然留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五四"文学革命毕竟是最集中、最强烈、最突出、波及面最广的一次划时代的文学革命,距离"文学本身"也最近。所以,"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的杰出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胡适先生也曾形象地说过,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会被驳得烟消灰飞,还有百日维新,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给全盘推翻了。可见,不能无视时代背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成熟情况谈论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出于同样原因,本文学史也认同"当代文学"的起点,是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期,具体是以同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为期,因为它揭开了当代文学的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帷幕，具有明显的标志性。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毕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划时代大裂变，比喻为"翻天覆地"，并不为过。即使今天，作为界碑，分水岭，依然鲜明。在文学上，当时确立了以毛泽东《讲话》精神为主体的价值坐标，它在思想、题材、语言、风格、人物谱系、作家队伍及出版方式上，都发生了空前变化，与前三十年明显区别开来。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取了"既分又合"的方法。我们没有采用"20世纪文学"的概念而沿用了"现、当代文学"的概念，首先是承认"分"的一面的客观性，主张在大的板块上维持原有的划分，因为现、当代文学在前后时段和不同层面确乎存在着反差和矛盾，由这种自然形成的比照进入，可以深入认识整个文学发展的轨迹及其不同特质；而就"合"的一面来看，通过对其相通性、连续性因素的探寻，便于把握历史进程中文学深层的内在关联。所以，"现当代文学通史"不仅仅是时间概念的贯通，也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其异同，而且是具有新的文学史的意义。它在内在精神上、注重一以贯之，提倡从思潮到观念到主题演变到创作方法到文体实验，把现、当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

二、在"现代性"的烛照下重新认识现当代文学

历史常写常新，因为人类不断用新的历史理性精神审视历史，提供新的理论视界和研究方法，随之带来对文学史的诸多新发现和新认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现代性"之被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使学人们一直寻求的20世纪文学的总体性，或者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性，有了一个最恰当的框架。这个概念具有强大的历史黏合功能，潜在的总体性，流动性，可以在较大的历史跨度内，把不同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发掘出它们的历史品性。因而，现代性这一概念对于重新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启蒙与救亡两重变奏，或启蒙、救亡、翻身的三重变奏，可以因现代性而找到内在的关联与矛盾；至于更为庞杂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以来形形色色的思潮，阶段，主义，口号，均可因现代性而打破它们各自"孤立"的状态。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现代性是润滑剂或调和剂，一切差异、矛盾甚至斗争，皆可用现代性来抹平，包容，回护，从而作出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解释。有现代性，就有反现代性，文学的历史河流里从来就不缺少冲波逆折。举个例子，比如历史上曾经把"大众化"推到极端，用愚昧取代了文明，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化大众"的功能，这一被人为扭曲的思潮的反文明性质，今天用现代性的"灯"一照，就可看得更加分明。

然而，现代性是一个具有多重阐释可能性的概念，对它的涵义的理解存在错

位、含混、歧义，它在西方和中国的文化研究中，差异甚大，有时还可能出现悖反。我们应该注意克服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把现代性虚玄化，另类化，悬置起来，等同于现代主义直至后现代主义，于是断言在中国现代性从来就"不在场"，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现代性，中国只配有"近代性"；另一种是把现代性视为无所不包的箩筐，当作回避意识形态矛盾的安全港，把一切混融在现代性之中，代替对具体问题的深刻分析。在我看来，现代性不是万能的度量衡，不是思想源，而是一种向度，一种路标，一种阐释方式和价值视野。我们不妨追问一句，到底什么叫现代性？其实，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并不那么高深莫测，它的发生显然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直接关联，它的主要内涵应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契约精神，批判精神，个体的主体性，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等，它毫无疑问与宗法文化，与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尖锐地对立着。现代性同时又是一个敞开的发展的观念，它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必然不断涵纳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作为从西方移植的概念，现代性必然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转化过程。从现有资料来看，现代性受到资本主义兴起，人类进入新纪元的鼓舞，主导方向表达了与传统断裂，告别中世纪的愚昧，面向理性之光的信心，它充满了运动、变化，是与进步、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概念。但同时，现代性本身充满矛盾，一方面它代表理性，代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变革精神，另一方面，它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有时反倒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是自19世纪中国与西方遭遇之后，产生的一种历史观、世界观，也指涉中国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后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观念变化。有人据此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具有非理性倾向，文学的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肯定，而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文学作为审美活动，具有超现实的自由精神、批判精神，而反现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上没有反思和批判的现代性。为什么呢？据说因为"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引进19世纪文学思潮，没有引进现代主义；革命文学引进了苏俄文学思想，鼓吹政治理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没有引入现代主义；新时期文学恢复"五四"传统，主流仍只是对人道主义的肯定，还是没有让现代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就还是没有现代性，于是断言，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

这样的意见，相信不可能得到多数有识者的认同。试想，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不算现代性，人道主义不算现代性，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不算现代性，那么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如果文学呼唤理性、民主与科学被视为保守，对人道主义的肯定被视为"不现代"，那么，怎样才算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呢？答案只能是，非理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才能叫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这样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了。我以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须要从中国的现代化的具体历史进程的实际出

发，须要从中国进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在进行的“现代转型”出发。现代性是个发展的观念，它也有前期、晚近期的不同阶段，不可以晚近的现代性来苛求早期的现代文学。

在钱理群等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认为“现代文学是用现代的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①]这里就包含了某种对现代性的认知。区分旧文学与新文学的分水岭，最根本的，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现代性。就以现当代中国小说为例吧，它们无疑是与中国古代小说相比较而存在的。这里含有时间和内涵两层意思。在时间上，一般来说，现当代小说是指“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至今近一百年间的小说。在内涵上，首先，现当代小说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或文白间杂的古代白话文，是以借鉴西洋小说格式取代了中国古代小说章回、话本、笔记体的格式。当然，在内涵上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观念和意识的不同。古代小说，即使是含有大量民主性精华的优秀古典小说，总体上仍与封建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写历史，总不忘归到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写道德，总不忘归到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写命运，总不忘归到生死轮回的宿命论人生观念，而结尾又总是跳不出“大团圆”和因果报应的窠臼。在这里，历史循环论与进化论，专制的文学与人的文学，贵族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艰涩的“山林文学”与通俗的“社会文学”，泾渭分明，这既是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标记，也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的价值坐标。现当代小说在把握生活的眼光上首先要求贯注现代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它的属性应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近一百年来，为了人民的独立解放和民族的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因而现当代小说的题材是极其丰富的，广阔地描绘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表现他们无比丰富的思想和美丽复杂的人性人情。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总是映现着对人的尊重，对“国民性”的反思，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对现代文明的呼唤等等繁复的文化意蕴。这一切能说与现代性没有密切关联吗？

现当代文学何以能够在外在条件剧烈变化的情势下，保持着自己的主潮激荡前行，仍有那么多的作家跨代跨际，延续着自己的创作生命，还有更多的新起作家继往开来？这只能说明有一种相通性存在。这种相通性过去被遮蔽了，但实际一直在起作用。现代性是否就是众多的作家共同的内心憧憬和价值路标？现在看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背景，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世界化”与“民族化”。“世界化”又包括“欧化”和“俄苏化”两条路径。其中，“俄苏化”对左翼作家、抗日民主根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据地作家、解放区作家影响极为深远，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更是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性写作倾向。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语境下，“欧化”再次蔚为风潮，“大众化”、“民族化”作为强调本土的审美标准和文学发展方向，同样源自于现代性追求，它在延安被突出地提出，其实可远溯至“五四”时期和二三十年代的相似吁求，又直接导致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基本风貌。然而，物极必反，这种思潮被强调过头又会违背初衷，变成一种禁锢和封闭，延缓了现代性的发展。再如，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和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回响和接通，而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形成的“左翼文学思潮”则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解放区乃至建国后“十七年”都以不同的面目流贯，直到“文革文学”步入彻底反现代性和荒谬化。现代主义思潮早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就已引进中国，但因语境原因声息渐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遇合变革、开放的氛围，再度风行，成为纯文学圈内不少先锋作家奉为圭臬的标志。

然而，如果有谁认为现代性只能是与现代化进程保持一致的同步观念，如果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只是以文学的手腕和形象来“配合”现代化要求的话语，那将是对文学现代性的莫大误会和庸俗化曲解。那也就只剩下虚浮的昂扬，没有了深沉的思考的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是文学的现代性，就不能不诉诸审美和情感，所以文学的现代性要在文学中发生作用，将会置换为现代性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这种情感和意识可以带有抗辩性，悲剧性，批判性并且充满怀疑精神，以至陷入迷茫也不要紧，因为它是文学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从哲学上讲是站不住的，但从文学上讲就绝对有理。黑格尔说过，假如没有情欲，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成功。这就是文学的眼光和说法。这里还想举一个例子，2002年首次发表了毛泽东1939年11月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现在，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基于这样的看法，毛泽东认为，“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①]我相信这是毛泽东对鲁迅创作最真实的想法，我认为这也是评价鲁迅的另一个视角，是“一家言”。但我们分明可以感到，毛泽东是以政治家的眼光看鲁迅，他也涉及到现代性（“老中国”，“新中国”），但他讲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现代性，而鲁迅的“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却是出于文学的人学本性和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因为“未曾经验农民斗争之故”。

① 龚育之：《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致周扬的一封信》，《学习时报》，2002年6月10号

由此我很赞赏黄子平等三人对"悲凉"的发现。尽管当时还没有流行"现代性"的提法，但他们领悟到了这一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质，并将其贯通之："从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巴金的《寒夜》，以及新时期文学中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到中年》《李顺大造屋》《西望茅草地》《黑骏马》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中，你体验到的与其说是'悲壮'，不如说更是一种'悲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一方面，'历史的必然要求'已急剧地敲打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产生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与实现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却严重脱节。同时，意识到这一要求的先觉者则总在痛苦地孤寂地寻找实现这一要求的物质力量；……这样一种悲凉之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特具的有着丰富社会历史蕴含的美感特征。"①

三、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现当代文学的贯穿性思想主线

现当代文学的时代背景不断转换，每个时段的焦虑中心不同，但抛开表层的即时性要求，减去抗日时期的时事剧，活报剧，小品，大跃进年代的口号诗和歌谣，"文革文学"的畸形膨胀的政治话语，粉碎"四人帮"时的民间诗歌，政治剧等等（非文学现象不止这些），我们发现，仍有一条相对稳定的贯穿性思想主线在时断时续地顽强潜行，实际上决定着文学深层价值追求的选材倾向。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就是这种贯穿在现当代文学历史中的思想主线和精神命脉。在一百年来的文学中，它不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没有变化、演进，它在每个时期侧重点不同，反封建，反专制，反理学，反宗法，反侵略，反阶级剥削，反压迫，反殖民，启蒙，建设，改革，开放，它不时地游离，有过许多曲折，弯路，失误，却又磁石吸引一样不断地回归。笔者曾经提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和铸造："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主线索，绝非笔者的玄想，而是众多作家呼吸领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②。现在看来，这一归纳完全适用于对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我们不说现实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人道主义是贯通性主线，而说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贯通性主线，乃是因为它不局限于某一种创作方法，不是哲学理念，而是更贴近作为人学的文学，更科学，也更具长远战略眼光的一种归纳。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承继晚清梁启超等人的"新民"主张，提出了"立人"思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② 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想，自觉地以“改造国民性”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的这一追求，虽不能包容全体，却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显现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主导思想脉络。李长之在谈到鲁迅时说，他永远对受压迫者同情，永远与强暴者抗战，他为女人辩护，为弱者辩护，他反对群氓，反抗奴性。《阿Q正传》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追求，阿Q遂成为共名。在对阿Q的阐释中，有人指出它表现了人类性的弱点，固然不无道理，但它首先是写出沉默国民的灵魂，写出中国农民的非人的惨痛境遇，以及他们的不觉悟状态。举凡腹诽主义，自欺欺人，自轻自贱，摆“先前阔”，健忘，欺压更弱小者等“精神胜利法”，均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同样，闰土的麻木，看客的冷漠，华老栓们的愚昧，鲁镇上的众生对祥林嫂的痛苦的无动于衷，都是那样地震撼人心。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中，他以漫画式的辛辣笔触，对“媚态的猫”、“二丑”、“巴儿狗”、“山羊”、“落水狗”、“细腰蜂”、“奴隶总管”等的概括，无不指向诸“社会相”的文化心理深层，使得人们必须认真地对国民灵魂以及自己的内心进行反省与拷问。继续着这一审视的，是侨寓者的“乡土文学”：一方面是对那片“净土”的深刻的眷恋，另一方面是对“乡村”的深刻批判；“乡愁”包含着批判的锋芒，“异域情调”蕴含着对“乡土”的浪漫回忆。继之，沈从文笔下的野性的返归自然，充满生命意识的人生样相，折射出的是作家对民族雄强活力的渴盼。在老舍的笔下，旧派市民的保守、苟安、中庸、迷信、怯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审视等，无不是对国民性批判这一文学传统的独特承传。

“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没有中断，只是它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声浪的覆盖下以更隐蔽的形式潜在着。赵树理的《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中，对农村中一些人物的自私、狭隘、懒惰有惟妙惟肖的刻画。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这一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形象，实际上是对中国肩负着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因袭精神重担的农民形象的高度概括，他那谨小慎微、动摇、观望的矛盾心理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心态。新时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也让人过目难忘，日子好起来的农民陈奂生进了一趟城，寻找与人平起平坐的感觉，住五块钱一夜的招待所愤愤然，后来就心安理得了，他让我们想起阿Q的某些精神气质，但比之阿Q，他毕竟开朗多了，有人评论说，“陈奂生性格”是国民性格中美德与弱点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作家对“民族灵魂的发现”是较多从否定方面立意、希图文学能对建构健全的国民性有所助益，那么，“民族灵魂的重铸”则从正面表达了作家对理想国民的想象。从沈从文对湘西天真、淳朴边民的讴歌，“左翼文学”中对浪漫革命者

形象的塑造，老舍对天佑太太、韵梅以及愤起之后的诗人钱默吟的倾心礼赞，到建国后“十七年”时期作家在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中对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夸饰打造，都可作如是观。从《原野》的仇虎到《红旗谱》的朱老忠到《红高粱》的余占鳌，可以见到中国农民的英雄梦想和对原始强力的渴望。在诸多理想型的人物中，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嘉轩这一形象的文化意蕴颇为复杂。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威望素著，但在几十年颇来倒去的政治斗争中，他越来越陷入无所作为的尴尬。究其根本，他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他的人格却充满了沉郁的美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某种道德境界，东方化的人之理想。这里包含着作者对中华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观照与思考。

自从鲁迅先生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乡土文学一直保持着强盛的创作势头。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又有了身在华北的大量汲取民间民俗话语的赵树理、马烽和抒情型的孙犁等人，以及更接受西洋写法的柳青、周立波、丁玲、陈残云等。建国以后，乡土文学更是蔚为大观，直到80年代，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主体形象。高晓声、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张炜、李锐等作家，均以乡土创作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史地位。可以说，中国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农民文学。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文学这样，与农民形象农民问题有如此深刻的不解之缘。在文学传统上，20世纪中国文学除了对中国农民和乡村的持久关注之外，对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书写，对妇女命运的同情与关切，也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些都与总主题息息相关。每个方面，都是可以建立起人物的谱系的，由此可引出农民，知识分子和妇女三大人物谱系。

关于知识分子主题的发展脉络曲折复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这一叛逆者的疯言疯语，使我们感同身受一个“独战庸众”的个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有所发现的紧张，以及最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苍凉心境；《在酒楼上》通过吕纬甫与“我”的邂逅，吐露“蝇子式的绕圈圈”的生活苦闷，表现了现代知识者的孤独，颓唐，失落，妥协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感。是鲁迅先生开启了知识分子自我审视、自我启蒙和真诚忏悔的先河。在钱钟书的《围城》里，方鸿渐是个充满自我矛盾的人物，他既正直又虚假，既真诚又油滑。在几十年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里，倪吾诚上演了另一出文化性格的悲剧，他向往西方文化，却无时不在传统文化的包围之中，被几个乖戾的女性折腾欲死，受虐而又虐人，忍受着无可解脱的痛苦。我们记得“激流三部曲”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遭到无情的摧残，觉慧的反抗和出走，曾带来了怎样的曙光和气息，而新时期巴金的《随想录》，既是作家在自己身上发现觉新品性，触摸到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奴隶根性，也是对鲁迅先生知识分子自审主题的接通，我们由之引起深深的历史感慨。郁达夫在《沉沦》等作品中写到

知识者由于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而导致的沉沦，在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身上似乎也能发现，而郁达夫等人的“自叙传”小说体式，在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创作中又一次得到印证，然而历史却经历了何等的沧桑巨变。叶圣陶笔下的灰色小人物，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憩园》《寒夜》，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十七年”时期的《红豆》《青春之歌》，新时期王蒙、李国文、王小波等人的小说，都为我们奉献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足以构成一个深长的人物画廊。

女性形象体系同样摇曳多姿。“五四”文学对于女性的发现和第一代女作家灿若群星的集体亮相自不必说，第二个十年中莎菲女士的出现是重要征象。她的身上，理想与现实，灵与肉的冲突达于极致，个性自由浪潮冲击下的她，有摆不脱的孤独。她是中国式出走的娜拉，没有独立，只有苦闷。直到七十年后，一些年轻的女性主义写作者，仍然在回应丁玲的声音，现代当代的莎菲们依然活着。曹七巧、郭素娥、李香香、萧萧、虎妞、繁漪、田小娥、黑氏、陆文婷、冯晴岚、司绮纹、王琦瑶、吴为、玉米所有这些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性都在某些方面存在基因和血缘的联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性决定了“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绝不是单一的静止的，它是一条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延伸的主线，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对国民性的发现到对现代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深沉思考，从较狭窄的视角走向宏阔的文化视野，它将伴随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不断深化下去。

四、游离与回归——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

从现代到当代，文学的口号之争，主义之争，流派之争，方法之争，不可胜数，从未间断过，它们都与其所处的特定时期思想文化背景的变幻，政治斗争和社会思潮的起伏密切相关。比如，人性与阶级性之争，就是一个贯穿题目，前有鲁迅与梁实秋之争，中有五六十年代对巴人的人性论的批判，上世纪80年代则有人性与异化问题的大争论。再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是贯穿始终的问题，早期有“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之争，40年代《讲话》发表似乎廓清了是非，但50年代，60年代仍有隐蔽的争论，到70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有了对“工具论”的批判，80年代观念革命时有“回到文学本身”的吁求，一直未曾停息。其他如主体论之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大众化”与“化大众”之争等等。应该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治化思维起着决定作用，争论双方都过于重视对方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对于争论本身的文学性内涵和思潮性指向，却往往忽略。在今天，既然要以贯通的眼光来看，就应该突出文学思潮的激荡、演变和连续性，突出文学的规律性，不宜过多纠

缠“左与右”、“敌与友”之类的是非——在时间的冲刷下，后者显然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了。

关于现代文学思潮，有学者指出，“五四”时期，“在当时发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思潮都有一个‘中国化’的‘变形’过程。就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影响最大，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学主流；浪漫主义也有较大影响，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属于现代主义范围的各种思潮也曾吸引了许多作家，做了多种试验。”[①]。事实上，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新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存于此一时期。当我们联系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等的相继出现，对此将有更深感触。当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兴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略晚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出现，但也辉煌一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则初露端倪。一些学者在描述三大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时认为，20世纪30年代，随着政治和文化氛围的变化，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出现了文学观的倾斜，导致了“拉普派”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误导，后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进和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匡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由于“左”的文学观念的纷扰和社会关注重心的转向而趋于衰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一度鼎盛，在文学实绩上表现为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诗派。到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是主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进一步衰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则在悄然行进。其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出现了抗战文学思潮的发展路径。[②]关于当代文学思潮，一般认为，“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主要是沿着“左翼”文学的方向发展，带着从延安时期就大力倡导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色彩；文革时期，“左”的倾向推到极致，出现了“文学激进思潮”[③]；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演进次序分别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潮”、“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也有一些论著对当代文学思潮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梳理，把当代文艺思潮归纳为：本体论的、主体论的、生产论的、价值论的、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等。[④]这种梳理虽不无道理，但偏重横的排列，相对忽视了现当代文学思潮之间的内在连续性。

当我们强调回到文学本体，扣紧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内在关联性时，便可对现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② 刘增杰、赵福生、杜运通：《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④ 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